



左图：唐长孺先生过世后家中装修过几次，每次装修完毕，唐刚卯都将父亲的书房“复原”。
上图：1974 年 6 月第 1 版《魏书》点校本出版后，唐长孺先生仍在不断审读，记下了不少修订意见夹在书中(小图)。

◀ (上接 5 版)

人，还去唐家唐先生的书房中找到了一些手稿和书信来读。于是，唐先生的另一面出现了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时局动荡，唐先生常有诗作问世。1941 年 9 月 18 日，他在日记中写下七律《“九一八”感怀》(题为王素所拟)，其末句“劫余重洒新亭泪，辜负黄华泛酒卮”，读来令人唏嘘。在这首七律之上，他还写道：“监谤之术，厉于防川；中饱之欲，盈于巨壑。此所谓不亡不止者也。”王素说，这一年唐先生在上海担任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教员兼任光华大学讲师，他推测是先生眼见物资紧张，奸商囤货居奇，感愤之余写下此篇。

到了 1942 年，日寇占领“孤岛”上海，光华大学解散，圣玛利亚女子中学将隶属汪伪政府，唐先生去意已决。经吕思勉先生介绍，他前往民国政府 1938 年于湘西建立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(该校即钱锺书《围城》中所记“三闾大学”原型之一)，旅途艰险又满目疮痍。等安顿下来后，他写下了七绝《感时》(题为王素所拟)：“崖山残腊竟何年？东望颓波一怆然。会逐麻鞋听杜宇，蜀山蜀水不胜怜。”今读此诗仍能感受到先生当时的遗恨之情。

除了这类日记中的诗词，唐先生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文字同样直抒胸臆。1944 年，他由蓝田国师调入乐山国立武汉大学。1946 年 5 月，武汉大学重返武昌珞珈山，唐先生任历史系教授。1947 年，中共领导全国学生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，武大为武汉学潮中心，6 月 1 日凌晨 3 点军警闯入武大搜捕，历史系黄鸣冈等 3 名学生遇难，金克木等 5 位教授被捕，史称“六一”惨案。唐先生在武大教

授会抗议书上签名，主张“罢教”，并且具名撰写挽联悼念学生：“未死敌，竟死官，龔舍作屠场，学子何辜，定知泉路不瞑目；既离心，复离德，穷途哀国步，斯民为贵，毋乃古人之虚言。”王素记得，1993 年夏天他去武汉拜谒唐先生时，老先生提及当年旧事，仍“喟然长叹”。

从《唐长孺诗词集》来看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唐先生诗词的“高产期”。由于家学渊源，唐先生的诗词功底极深，他的诗作常为各种名流称道。1929 年，唐先生还在读大学时就撰写发表了多篇古体诗，为诗人金松岑赏识，称其诗“幽涩似(孟)郊、(贾)岛，又似永嘉四灵，亦受散原(陈寅恪父陈三立)影响”。王素说，1949 年后的 20 余年，唐先生没有诗作。原因或可参见他写给汪荣祖先生的信：“长孺少年时颇耽倚声，中年以后专意治史，遂少写作，偶一为之，亦多不存稿。”

1970 年代，唐先生又有一些诗作存世。1979 年，“文革”时期北大首位殉难者、陈寅恪弟子汪篁的遗稿《汪篁隋唐史论稿》编竣，唐先生为之写了序言，并题写一首五律感怀。而这部书得以问世，亦有赖于唐先生的奔走倡议。此后直到 1994 年过世前，唐先生所做之诗，不乏针对时事的感怀之作。

1977 年，唐先生为启功先生丧偶作《一萼红》以表追悼，并收录于启先生的悼亡诗集中。唐先生与启先生结缘于 1970 年代点校“二十四史”时，很多人都说，当时唐先生其实和启先生最聊得来。

魏连科说，唐先生和启先生在诗词之外，还常聊书法、古画。他记得，唐先生常去逛文物商店，由于眼力好，经常“捡漏”一些字画。唐先生的弟子、武汉大学教授朱雷说，唐先生去故

宫看书画时，尤其擅长讲解明清字画。于书法深有研究的刘涛告诉记者，他有次去见唐先生，老先生要他翻开一部楹联集，说某页上的对联曾是自己父亲的藏品，经常拿出来张挂，从小时就看熟了。唐先生视力不好，他让我看楹联左下角铃盖的印章，果然是唐先生父亲的收藏章。在刘涛看来，唐先生的字有古风，估计以前临过魏晋的法帖，写的竖钩都是平挑，而非颜真卿、柳公权那样的斜钩。

张忱石告诉记者，在点校时期，老先生们一块儿聊天，“唐先生什么都能聊得上，兴趣爱好之多，知识面之广令人惊叹”。他记得王仲荦先生常开玩笑道：“这肯定是他小时候从嘉业堂的藏书里看来的。”据唐先生日记，那时他常去母舅家的嘉业堂，“常览者有三：一为中国古典文学；二为‘五四’以降的‘新文学’；三为 17 世纪以降西洋之文学名著”。在朱雷的印象里，唐先生也看武侠小说，如清末民初的《金台平阳传》，解放前的《北海屠龙记》《蜀山剑侠传》都看过。在四大名著中，唐先生喜欢聊《水浒传》，“他最喜欢鲁智深，因为鲁智深除暴安良，而且不伤及无辜”。唐先生还告诉他，中学时读过美国侦探小说《裴洛凡士》，“我跟唐先生说我也看过，他很高兴，当场就背了起来”。1976 年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唐先生还去买新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集来看。

唐先生热爱昆曲艺术，1927 年在上海读中学的他，居然一度休学半年，去苏州昆剧传习所跟名角华传浩学昆曲，兼习弹词。在唐先生家至今保留着一抽屉昆曲、京剧、评弹的卡带，唐先生的次子唐刚卯说：“父亲一直到晚年都还在听这些磁带，常常哼唱。”

唐先生 7 岁时入家塾、小学堂学习，主课除了国文、数

学，还有英文。1936 年，唐先生经友人介绍到上海启明书店从事翻译。在此后的几年中，他先后翻译了《富兰克林自传》《威克斐牧师传》《金银岛》《月明之夜》，以及赛珍珠的作品《东风西风》《大地》系列等。王素综合唐刚卯与柳义南的回忆，记录了一则逸闻：唐先生在翻译时不爱署真名，于是赛珍珠的《大地》系列《儿子们》的译者是一个叫“由稚吾”的人。书出版后，出版社通知唐露葵去领稿费，家人愕然。后来才知唐先生的“由稚吾”乃“由幼稚之吾”之意，给妹妹一个惊喜。

朱雷记得，唐先生也有过“小资生活”的时候，只是机会很少。1946 年武汉大学回迁时，唐先生就在汉口的上海电影院看了进口好莱坞电影《钟楼怪人》。朱雷说：“唐先生难得出去吃顿好的，但如果去，一般都是他请客。”唐先生喜欢吃山东馆子，尤爱王府井大街上萃华楼里的乌鱼蛋汤。他们还吃过几次西餐，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唐山大地震后文书整理小组临时搬到上海工作，唐先生请整理组的 6 个人一起去红房子西餐馆吃牛排。不过也有例外，有次唐先生请朱雷看京戏，看完想去友谊餐厅吃俄罗斯菜，结果发现钱不够，最后是朱雷请他吃了饭。冻国栋说，上世纪 80 年代，唐先生在春节前后有时会让学生到家中吃饭，“每次都有唐先生青少年时代过年吃的‘一品锅’，里面必有火腿”。得知冻夫人是苏州人后，唐先生还付钱请她帮忙从苏州买来火腿的中段。1986 年，冻国栋陪唐先生去苏州开会，唐先生还让他去观前街买点小吃。

“唐先生家里经济负担一直挺重，这点很多人都知道。”朱雷记得，唐先生在北京时，每年回家前都要买火腿，“那个火腿是越买越小”。1985 年冬天，唐先生去内蒙宾馆买羊肉饺子，结果不小心洒了，求着服务员再下了一碗。1986 年元月，唐先生只能去农民工开的饭店吃饺子了。1990 年代初，唐先生的好友、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吴于廑先生找到湖北省委，提了唐先生的经济状况，省委



给唐先生拨了 1000 元补贴，但唐先生没有收。后来，考虑到唐先生从 1974 年开始兼任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主任，文物局又给过唐先生一笔 6000 元的补贴，但他也没有收。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王毓瑾骨折、唐先生重病，唐先生还为此预支过《山居存稿》的稿费，甚至想变卖家中收藏的字画。

“父亲跟母亲感情很好，对我们四个孩子很关心。”唐刚卯说。他记得父亲赴京点校“北朝四史”时，由于北京物资供应比较好，父亲常会给家里带当时为专家配给的白砂糖。在点校结束专家们陆续返回原单位前，中华书局发了一张缝纫机票给点校组，大家决定抓阄。后来，父亲抓到了这张票，开心得不行，第二天就让他去把缝纫机买来。“那时正给我姐姐珞珈置办嫁妆，缝纫机可是当年的‘结婚四大件’之一啊！”

唐先生的处事之道

为什么同一个人会给不同的人留下如此迥然的印象？

在王素看来，这是因为唐先生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，对形势有着极强的预判，从而在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状态，以尽量降低外界对自己及家人的伤害。他举了几个例证：1958 年唐先生让夫人从武汉大学图书馆辞职，是因为几次政治风波后，他敏锐地发现，“只要没有了单位，就没有了去批斗她的人”。1959 年唐先生赴京参加全国史学工作者会议，适逢陈垣入党，他接受大家推选作《贺陈垣同志入党》一诗。两年后，唐先生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唐先生一次次赴京参加点校“二十四史”，且表现甚好。点校即将收尾前，他又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写信，申请整理吐鲁番文书。“他的目的就是离开武大这个风暴中心，尽量留在北京。”

不过，也有人认为这个说法有些“神化”了唐先生，况且在那个年代，形势是无法尽在掌握的。

(下转 7 版) ➡



左图：唐长孺先生译《大地》(1939)封面，译者署名为“由稚吾”。右图：唐先生生前爱听京剧、昆曲、评弹。